

《資本論》(第一卷)
历史典据注释(初稿)

孟 氧 集士

杭州大学政治系資料室翻印

一九六一年十二月

为了配合“资本论”的学习，我们翻印了孟氧、集士两同志在“教学与研究”上（自一九五五年第七期——一九六〇年第七期）陆续刊载的“资本论（第一卷）历史典据注释”（初稿），供同志们参考。

杭州大学政治系资料室

一九六一年十二月

几 点 说 明

(1) 这里所指的“历史”，首先是指经济学说批判史，但也包括“资本论”中一般性的历史事件和历史人物。“典据”所指的是典故和某些材料的出处和根据。

(2) 我仅仅只是尽可能从“资本论”的角度注释某一人物或事件，它不包括对于该人物或事件的全面评价。

(3) 其中不少人物都是从经济学批判史的角度去注释，例如休谟、洛克、霍布斯等哲学家，在“注释”中是从他们和经济学有关的方面着眼的。

(4) 为了便于查对有关著作，人名和某些专用名词书名暂时一律只附俄文。

(5) “注释”按照“资本论”的篇章依次排列。人物一般地注在第一次出现的地方，但也有不少例外的，如烏尔等经济学家，沒有在序文部分中注出，因为在这里只提到他们的名字，而在另外的地方，却一再征引他们的著作，所以把关于他们的注释放在另外的地方了。

(6) 某些重要的人物（如里嘉图等等），先后在好几个地方，以专门的題目注出他们的某些观点。

(7) 每条注释一般地在五百字左右。只有两种情况是例外的：对于特別重要的人物事件，注释较详细些；对于那些比较不重要的人物事件，则只提一两句。另外，也有极个别的地方，由于掌握可靠的材料不充分，注得很少。

(8) 每条注释下面括号内的数字，是指“资本论”中文译本新版的页数。

《资本论》历史典据注释(初稿)

马克思在政治经济学领域中所完成的科学革命，在“资本论”中得到了最全面和最深刻的论证与发挥。正是这部不朽的巨著，它为共产主义理论奠定了科学的基础，并提供工人阶级以锐利的战无不胜的理论武器，去为自身的最终解放与一切被剥削被压迫的劳动人民的最终解放而斗争。

政治经济学是党性的科学，是无产阶级斗争的理论武器。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是在和各色各样资产阶级的、小资产阶级的政治经济学作斗争中成长起来的，“资本论”的副题叫做“政治经济学批判”这不是偶然的。“资本论”包括了一部经济学说批判史。

政治经济学是历史的科学。在建立自己的理论体系时，马克思批判地总结了一部世界史，特别是资本主义社会发展史。在“资本论”里，理论和历史和谐地结合着，一个范畴到另一个范畴的过渡，那无疑是实际的历史进程在理论上的反映。

政治经济学是党性的科学，是历史的科学，这就是我们作“注释”时必须掌握的根本依据。

文学家，对于马克思就是历史的见证人。在“资本论”里，他不仅引用过但丁、莎士比亚、西万蒂斯、歌德、巴尔扎克这些作家的著作，甚至象古代作家如荷马、梭福可士、荷力士的诗篇也加以引用。在“资本论”里，我们还可以见到希腊神话、罗马神话、北欧神话和印度神话等。利用文艺形象来说明科学上深刻的理论命题，在这方面马克思也表现了惊人的才能。

“资本论”是一部百科全书式的巨著，但它并不象资产阶级为怕工人们去阅读而恶意宣传的那样难懂。当然，对于那些急于求成而又没有钻研志趣的读者，却又另当别论。马克思逝世以后，有人主张“资本论”应当更“通俗”些，恩格斯不同意这种“意见”。他在

“资本论”第三卷的增补与跋文中曾经写道：“……为读者的便利，从而把文字的典据性牺牲掉。但我不是这样理解我的任务。我沒有任何权利采取这种编辑方法。马克思这样一个人当然有权利要求他的科学发现，完全依照他自己的说明，传到后世去”（按：这段引文参照“资本论”中译本新旧版本）。也正是因为这样，阅读“资本论”就会遇着一些由于我们自己的知识不足而引起的困难。

马克思使用的语言，一字一句都好象是在铁砧上鍛炼出来的，使人见到形象，听到声音。马克思引用历史典据、神话传说，经常总是用来嘲讽与鞭打资本主义制度以及它底奴仆式保卫者——庸俗经济学家。这种嘲讽与鞭打，使得他底敌人很难有还手的机会。而一颗热爱无产阶级的心就在“资本论”里面，永远不停地跳动着。“资本论”底科学结构与艺术形式是从屬它底革命內容的。也正是因为这样，要深入地学习“资本论”的整个体系，就必须尽可能全面地理解这些。

为了配合“资本论”的学习，政治经济学教研室指定我将“资本论”所包含的若干历史典据加以必要的注释。这对开始学习“资本论”的同志，在某些方面可能有些帮助，但对我说来，却是一件很困难的工作。在组织的大力支持与同志们热心的帮助之下，断断续续地写着，总算把一个粗糙的初稿大致写完了。现经“教学与研究”选登若干条，连续刊载。错误或不妥之处，势所难免，希望能得到同志们的批评和指正，帮助我进一步修改。

一九五五年六月七日

目 录

序与跋.....	(1)
第一章 商品.....	(1 4)
第二章 交換过程.....	(4 4)
第三章 貨币或商品流通.....	(5 5)
第四章 由貨币到资本的转化.....	(7 9)
第五章 劳动过程与价值增殖过程.....	(9 3)
第六章 不变资本与可变资本.....	(9 7)
第七章 剩余价值率.....	(9 9)
第八章 劳动日.....	(1 0 4)
第九章 剩余价值率与剩余价值量.....	(1 3 2)
第十章 相对剩余价值的概念.....	(1 3 4)
第十一章 协作.....	(1 3 6)
第十二章 分工与手工制造业.....	(1 3 9)
第十三章 机器与大工业.....	(1 5 2)
第十四章 绝对剩余价值与相对剩余价值.....	(1 7 3)
第十五章 劳动力价格和剩余价值的量的变化.....	(1 7 7)
第十六章 剩余价值率的各种公式.....	(1 8 2)
第十七章 由劳动力价值或价格到工资的转化.....	(1 8 4)
第十八章 计时工资.....	(1 8 9)
第十九章 计件工资.....	(1 9 0)
第二十章 工资的国民差异.....	(1 9 3)
第二十一章 简单再生产.....	(1 9 6)
第二十二章 由剩余价值到资本的转化.....	(1 9 9)
第二十三章 资本主义积累的一般法则.....	(2 0 9)
第二十四章 所谓原始积累.....	(2 5 0)
第二十五章 近代殖民学说.....	(2 8 8)

序言和跋

拉萨尔偷窃马克思的著作（二）

拉萨尔（Ф.лассаль 1825—1864年）——德国工人运动中的机会主义者。马克思称拉萨尔派为“皇家社会主义者”。

关于拉萨尔，恩格斯曾经说过：“且不问拉萨尔的文学才能和科学才能，他总归是法国最重要的人物之一。他在今日是我们极不可靠的朋友，在将来，将会成为我们最确实的敌人。”历史完全证实恩格斯的判断。

一八六五年八月十五日马克思在给恩格斯的信中写道：“现在我觉得伊齐次（指拉萨尔——孟氧）连着‘他的’制造中的经济学，是十分可笑的，他所说的一切，表现他如同小学生，以最讨厌和最夸张的老太婆式的饶舌向大众宣告的那些原则（就是这个小注中所指的那些——孟氧），仿佛是他最近发明的，其实我们早已将那些原则如同小铜钱散发给二十年前我们的那些同志了”。

一八六五年二月二十三日马克思在给库格曼博士的信中写道：“在他的整个活动中，我和他断绝了关系：（1）因为他既最无耻地偷窃我的著作又好夸口吹牛；（2）因为我反对他的政治策略；（3）因为在未进行他的活动之前，我在此地英国就已明白向他解释并‘证明’过：由‘普鲁士政府’来做直接的社会主义事业简直是胡说。”

从这封信中，我们可以看出，偷窃马克思的著作“又好夸口吹牛”，是造成马克思和拉萨尔断绝关系的原因之一。

在给库格曼博士的另一封信（一八六六年十月十三日）中，马克思写道：“我还沒有十分决定，关于拉萨尔的偷窃是否需要在序言中讲几句话。他那班盲目的信徒无耻地跑出来反对我，无论怎样都会使

我这样做是合理的。”

马克思考虑的结果，终于在“资本论”初版序言中写下了这个小注。

麦杜莎的头和波西亚斯的帽子（四）

麦杜莎是希腊神话中著名的三魔女之一。

波西亚斯是万神之王宙斯和丹娜所生的儿子。当他成年后，出去从事冒险事业，以求得名誉。他所想做的第一件事情便是割下麦杜莎的头。

他从百怪之父法尔赛那里弄到了几件宝物：一双飞鞋、一个皮囊和一顶狗皮盔（即“隐身帽子”）。

把狗皮盔戴在头上，他可以看见别人，但别人却看不见他。

波西亚斯带了这些宝物，去寻找麦杜莎。

麦杜莎，她没有皮肤，满身都是龙的鳞甲，没有头发，头上盘着好多条毒蛇。波西亚斯知道，任何人只要被她看一眼，立即变成石头。等麦杜莎睡着时，波西亚斯跑到她背后，将她的头割下，装进皮囊，飞跑了。

马克思在这里使用“麦杜莎的头”这个典据，是用来比喻当时德国资本主义的丑恶面目。因为那时德国资本主义各方面的代表人物，他们都否认丑恶的现实，硬说资本主义底罪恶只在英法两国才存在，德国例外。马克思从古代希腊神话中借用了“隐身帽子”（狗皮盔）这个典据来讥讽这些先生们，说波西亚斯戴上“隐身帽子”是不让别人看见，而这些先生们却相反，他们戴上“隐身帽子”却不想看见自己，不看自己的丑恶面目。

蓝皮书（五）

“蓝皮书”是英国国会的正式文件，因封面是蓝色的，所以得到这个名称。其中包括议会考察团、工厂监督委员会、卫生调查团等等的报告书。

这些调查报告，实际上是资产阶级向其内部提供了和供认了资本

主义制度的惊人的罪恶。英国的议员先生们，对于它是不感兴趣的，他们将“蓝皮书”当作枪靶，计算子弹射透了的页数，以测验子弹的侵彻力。

马克思从旧书店中将“蓝皮书”买来，进行十分精细的研究。“蓝皮书”是研究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重要文献，对于那些写报告的人，马克思也十分重视他们。

恩格斯在其早期的不朽著作“英国工人阶级状况”一书中，也曾经利用“蓝皮书”所记载的事实。

官房学(九)

中世纪末，在德国诸邦，有一种议会称为“官房”，其职务在于管理“公产”和保护皇家的权利。马克西米里安皇帝于一四九八年设立了“内庭会议”，此后，“官房”的职权不仅是管理财政、租税和保护皇权，并且也研究社会经济秩序问题。

在“官房”工作的人员，需要受过一定的训练，所以在各大学设有“官房”学讲座，这是“德意志官僚满怀希望的候补人所必须通过的炼狱”。

“官房”学是一种知识的混合物，“官房”学者不仅研究经济学，如森林学、矿物学、普通机械学、国家……等等也都研究。最初德国土著的经济学就是从这里发端的。如说在英国最初研究经济学的大多数是大商人，那末，在德国就是一些大官僚。

有一首小诗描写“官房”学派：

“王爷坐在账房里，

一五一十打算盘；

王娘坐在客堂里，

吃着面包和蜜糖。

英国的古典派政治经济学(九)

马克思这里所说的“英国的古典派政治经济学”，是指自配第开始到里加图告终。这个时期英国资产阶级政治经济学，它是与庸俗经

济学相对称的。

英国古典经济学是资产阶级政治经济学所能达到的最高的成果。它是在资本主义迅速上升的时代、是在阶级斗争还未发展的时期产生的。它底最一般的特征，可以大致概括如下：

(1) 英国的古典经济学的著作家们，作为一个科学家，他们研究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内部的关系与联系，揭发资本主义底内部的规律，从而将政治经济学引导上科学的轨道上来。

(2) “劳动价值论”是他们所达到的最重要的科学的成果，是他们对于政治经济学的贡献。但是什么样的劳动、在什么样的条件下才创造价值，以及如何创造价值等等问题，他们并不理解。他们说“劳动创造价值”，但作为“工资劳动本身又有价值”，这个矛盾他们没有克服，也无法克服。

(3) 他们是资本主义制度底忠诚的保卫者，但不是作为奴仆，而是作为科学家而出现，他们相信资本主义制度的“进步性”。在他们看来，可变的只是生产力，生产关系是不变的，资本主义制度是永恒不变的“自然的制度”。

(4) 但是他们承认社会各阶级之间利益是对立的，特别是里加图，他底全部研究就是立足在这个基础上。从此，资产阶级的政治经济学就达到了他们所不可超越的界限了。作为科学的英国古典派经济学通过了里加图道出了最后的一言。

里加图研究的出发点（九）

里加图(дэйкальдо 1772—1823年)，英国古典经济学的完成者，资本主义机器大工业时代的经济学家。就整个经济学体系来说，在马克思以前没有任何人能超过他。他以自己底全部学说动员年轻的资产阶级去与土地贵族作斗争。在他所处的时代，年轻的资产阶级从里加图手中得到了理论武器，去从事以“谷物条例”为背景而展开的阶级斗争。

当现实生活表明利润率有下降的趋势的时候，作为资产阶级经济学家的里加图，因此而感到极度不安，他企图研究它，从理论上说明

它。

他底研究出发点，就是马克思这里所指出的：工资与利润的对立，利润与地租的对立，并把这种对立看成是社会的自然规律。

他认为利润率的下降乃是资本主义底一切过程的结果。由于粮食价格的上涨，引起了工资的上涨，而工资底上涨必然引起利润率的下降。他认为这中间，工人并没有什么好处，损失只是资本家，得利的是地主。

里加图认为，资本增加文明的结果，工作机会增加了，人口也增加了，从而对粮食的需求也相应的增加，因此农业便扩充起来，劣等土地也被耕种，使用劣等地需要更多的劳动，谷物价格昂贵起来，全国地租增加，生活费用相应的增加，工人要求提高工资，于是利润率下降了。

农产品的价格上升，但工业品的生产，却因使用机器的结果，劳动生产率提高，商品的单位价值降低，从而工业品的价格下降了。这样，资本增加文明的全部结果都落到地主的荷包中，地租增加、利润降低，工人并没有得到什么。

最终的结论便是：劳动者与资本家的矛盾，那是由于资本家与土地所有者之间的矛盾所引起的，劳动者可以和资本家一道进行反对土地贵族的斗争。

在反对土地贵族的限度内，里加图的见解具有进步的意义。

从此，资产阶级政治经济学就已达到它所不可超越的界限了。

西斯蒙第和里加图論爭（一〇）

西斯蒙第（Ж.СИСМОНДИ 1773—1842年）法国经济学家、经济浪漫主义者、古典学派在法国的完成者。

从小资产阶级的立場出发，他尖锐地批判资本主义制度，无情地揭露庸俗经济学家的伪善伎俩。

他既反对资本主义，又反对社会主义。他认为社会主义是将团体的利益代替个人利益，而小商品生产沒有个人的利益是不能存在的。但他也认为，个人利益要受到一定的限制，不然又会出现资本主义。

他将小商品生产与资本主义生产对立起来，企图将资本主义关系底基础打碎，用小私有制去代替它。这是一种反动的空想。

但作为古典学派在法国的完成者，西斯蒙第有着自己独立的贡献。在和里加图直接论争时，他强调指出创造交换价值的劳动之特殊的社会性质，并且说，价值量还原为必要劳动时间，还原为“全社会的需要与用来满足这种需要的劳动量之间的比例”，“是我们经济进步的本质”。

假如在里加图方面，经济学是无所顾虑地漫然得到了它的结论而告终结，那末，西斯蒙第则是补充了这个结论，他表现出政治经济学（即使是在资本主义还在迅速上升的时代）对于自己本身的怀疑。

魁奈医生（一一）

魁奈(Ф. кёнэ 1694—1774年)，出身于御医的法国著名的经济学家、重农派的创造人及其最大的代表。他是资本主义大农业的拥护者。

重农学派底故乡是法国。他们最活跃的时代是法国大革命时代。这个学派的代表们狂热地拥护资本主义发展，但却不希望撕破封建外衣。

魁奈强调交换是等价的，从而利润不可能从流通中产生。在反对重商主义者的斗争中，重农主义者将政治经济学研究的锋芒由流通领域转向生产领域。这是他们的功绩。

在农业领域中，在使用价值的形态上，魁奈在事实上对剩余价值进行了第一次的理论研究。他正确地陈述了一个命题：只有创造剩余价值的劳动才是生产的劳动。但他却错误地将它局限在农业领域，地租被当作剩余价值的唯一形态。

魁奈一方面将工资还原为最低限度的生活资料，把纯生产物归结为“对于他人劳动的占有”。但由于错误地将使用价值与价值混同，由是，便将剩余价值底生产与自然联系起来。他认为，土地的生产力，使得劳动者生产出来的使用价值量多于他们所消耗了的使用价值量，由是，剩余价值就变成“自然思想的结果”。这就是说，魁奈关于剩余价值的见解是两重的。

表现在“经济表”这一主要的著作中，魁奈底功迹就在于他分析了社会总资本的再生产与各个阶级之间的流通。就整个再生产的理论说，在马克思以前没有人能超过他（参考“经济表”那条）。

法国經濟（学）的狂飈时期（一一）

“魁奈医生死后法国的经济的狂飈时期”，这句话的译文不妥当。

魁奈是一七七四年死去的，他死后法国处在大革命的前夜，经济上并没有经过什么“狂飈时期”。

十八世纪下半期，法国还是一个农业国家，法国人民中的基本群众从事农业。那时农奴制的残余还存在着，农民的人身虽然是“自由”了，但他们所赖以生存的土地还为农奴制所束缚。在工业中，那时法国的城市还保存着行会组织，甚至科尔培时代所遗留下来的“工业管理法规”还存在着（它阻碍了工业的正常发展）。那时行会禁止在城市设立手工工场，大的资本主义的企业的建立受到限制。此外，路易十六的君主政体，土地贵族的统治等等都阻碍了资本主义的迅速增长，资产阶级力图突破它。恩格斯曾经指出过，甚至到十八世纪末，“刚在英国产生的大工业，在法国还完全不知道。”当然，这并不是否认那时资本主义关系在法国发展着，只是说，那时并没有出现什么“法国的经济的狂飈时期”。这里的“经济”的狂飈时期，是“经济学”狂飈时期的误译（这样的误译从文字本身往往是无法判断的）。

里嘉图死后的英国经济学经历了一个狂飈时期：“自一八二〇到一八三〇年间那一个时期，在英国经济学史上，是理论上最热闹的时期。其间，对于里嘉图的理论，充满着理论上的斗争，有的拥护，有的反对，并生出了一系列匿名的著作”。这样的情况，很容易使我们回想起魁奈医生死后的法国的经济学界。那时是法国经济学史上最热闹的时期，经济学家们展开了关于魁奈学说的论争。有的拥护，有的反对。如老米拉波、勒·德洛因、康弟亚克、加里安尼、林格、马伯里和杜尔阁（重农学派到他手中发展到最高阶段）等等经济学家（其中个别经济学家虽然并不是法国人）的名字就是和这场大论争相联系的。

所以当马克思讲到古典学派解体时才这样写道：“英国这个时期的经济学文献，叫我们想起魁奈医生死后法国的经济（学）的狂飚时期。但这只象是初冬小阳春天气叫人想起春天。一八三〇年，决定性的危机就发生了。”

底下，马克思接着讲资产阶级经济学庸俗化的过程。

庸俗经济学（一一）

马克思所指的庸俗经济学，并不是单指某一个经济学派或某一个经济学家的经济观点，而是将它与古典经济学相对称。

一般地说，庸俗经济学是在产业革命完成，资本主义在各个方面都已经取得统治地位，阶级矛盾尖锐化的时代产生的。它底最一般的特征大致可以概括如下：

（1）庸俗经济学家们埋首研究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外表，认为现象形态可以说明问题，由是，现象就被当作本质来把握。他们把资本主义生产当事人的观点，将他们在簿记中所记载着的东西，组织一下，加上几个经济学上的术语，当作“永恒的真理”来宣布。什么对他们有利、他们就说什么是“真理”。

（2）庸俗经济学家们将亚当·斯密学说中所包含着的一切庸俗的东西都集中起来，加以利用，并冒充是斯密的“追随者”。几乎是一切庸俗经济学家们都反对里嘉图，特别是反对里嘉图的劳动价值论，工资和利润对立的学说。他们否认劳动创造价值，他们不敢接触生产过程，因为在那会触到资本主义底剥削关系。

（3）庸俗经济学家们一般地否认剥削关系。否认经济利益的对立，进而否认阶级斗争的必然性。他们在一些場合说，利润是资本家高级“劳动”的报酬；在另一些場合他们说，利息是“节欲”的结果，资本家既然节制享受，那末他也就有权要求“赔偿”，那就是利息。象劳动者得到工资一样，资本家得到利润或利息是合理的，自然的。这就是资本主义“和谐”的基础。正因为这样，资本主义就是理想的无可代替的“自然制度”。

以上这些最一般的特点可以从马尔萨斯、萨伊、西尼尔、罗雪

尔、巴师夏和加雷等人的著作中在不同的程度与不同的形式下见到。庸俗经济学家辩护资本主义制度是作为资本的奴仆而出现在经济学说史上。

（在注释“资本论”的限度内，我只列举马克思以前或和马克思同一时代的庸俗经济学家，因此没有提到他们如何反对马克思主义的问题。）

巴师夏——庸俗经济中最浅薄从而也是最成功的代表（一二）

巴师夏（Ф.Бастия 1801—1850），庸俗经济学家。在法国，他是以一个反对社会主义“瘟疫”的“战士”的姿态出现的。

他从他底前辈的理论武库中偷窃了“社会的自然的组织”的论点，加以改装，制造出“社会和谐”的理论。这个论点是从美国加雷那里偷来的。他认为社会底“和谐”建筑在交换的基础上，“社会就是交换”。在交换中，各人贡献出自己的“服役”。这个论点是从法国萨伊那里偷窃来的。在交换中一种“服役”成为另一种“服役”的报酬，从这里他巧妙地引申出价值的定义来：“价值或价格不外是两种服役之间的比例关系”。交换双方对自己和别人底“劳苦与奋力”的评价，那就是衡量“服役”的标准。

至于什么是利息，巴师夏说：“利息是对于资本家所提供的服役的报酬”。这个观点是从英国西尼尔那里偷窃来的。他所进行的加工只是在这一点上：他把“节欲”这个字眼改为“延期”，资本家“延缓”了他的消费，这就是资本家的“牺牲”与“损失”，因此要得到赔偿，那就是利息。

很显然，即使是从庸俗经济学的角度来看，他也是一个毫无创见的经济学家，但他的特点就在于他善于改头换面地重复他底前辈的见解。因此，马克思在这里将他称为“庸俗经济学辩护论者中最浅薄从而也最成功的代表”。

德国社会经济的特点与德国庸俗经济学的特点（一二）

在德国，资本主义的剥削与封建剥削交错着。由于细小的住宅和

小土地所有制的存在，以及在这个基础上的农业与家庭手工业的结合，便将劳动者束缚在小住宅里，小土地上。很大的一部分德国工人就是从这样的劳动者中间分离出来的。大部分的德国工人并不受雇于近代的大工业，而是受雇于小本经营的制造业。在这里，资本主义的剥削往往还伴随着封建的剥削。而在农村中，德国还存在着“再起的农奴制”。

这样的情况的存在，它阻碍着资本主义迅速的发展，德国的大工业开始于十九世纪四十年代，到一八四八年革命后才得到第一次的高涨。比起英法，德国走上资本主义发展的道路要晚几十年。而在农业中，资本主义底发展走着普鲁士的道路。当整个的德国资本主义经济还未成熟时，其对立的性质已在英法显著地暴露出来了。

由于残酷的剥削所造成的阶级矛盾尖锐化，在英法工人运动强有力的影响之下，德国的工人运动广泛地展开。和这相伴存的，还有由于农民破产所造成的农村地区的革命化。这样的情况就造成了德国工人运动的特点，它和英法不同，德国工人运动不限于几个大城市，它广泛地涉及到许多地区。同时德国又是马克思主义的故乡，德国的工人阶级更有理论的教养，斗争的方向性更明确。

上述的特点，决定了德国不能产生有独创性的资产阶级经济学。资产阶级经济学在其发展中没有经过古典学派的阶段，一开始它就是庸俗经济学。而德国资产阶级经济学家们始终不过是“外国大商行的小贩子”。也正是这些原因，使得马克思只在极其例外的时候，才引用德国资产阶级经济学家的著作。

庸俗经济学在德国主要是采取历史学派的形式而出现，早期的历史学派反对古典学派与空想社会主义，晚期的历史学派反对马克思主义。

马克思在总结德国社会经济发展的特点与庸俗经济学的特点时写道：“德意志社会的特殊的历史发展，使德意志在资产阶级经济学上，不能有任何独创的造就，但其批判却不是这样。这种批判在它是代表一个阶级的限度内，是只能代表这个阶级。这个阶级的历史使命，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颠覆和阶级的最后废除。那就是无产阶级。”

彼得堡“欧洲通訊”一篇專門討論資本論方法的論文（一四）

一八七二年五月彼得堡大学教授、俄国经济学家考夫曼（Иоаким Фомин 1848—1916年）发表了一篇題名为“马克思对于政治经济学批判的观点”的论文。这篇论文就是马克思这里所指的“彼得堡欧洲通訊一篇专门讨论资本论方法的论文”。马克思在这里择引了考夫曼的论文一大段之后写道：“这位作者如此正确地描写了我的现实的研究方法，而在考察这个方法在我手上的应用时，又如此好意地描写了它，他所描写的，不是辩证法，又还是什么呢？”

德意志知識界“吹牛的战士們”（一七）

由于德国社会经济发展的特点所产生的大多数德国著作家的某些特点，马克思是十分鄙视的。马克思将德国庸俗经济学家们称为“空口的饶舌家”，这些“饶舌家们”是“外国大商行的小贩子”，是“生徒”、是“盲从者”。对于鼎鼎大名的罗雪尔教授，马克思有时称他为西尼尔“节欲”论“在德国方面的应声虫”。提到庸俗经济学家伏薛时，马克思甚至把人名当作动词来使用。

对于一大群德国的哲学家，马克思称他们为“猖狂的，自负的，平庸的。今天还在德意志知识界吹牛的战士们”。根据马克思给库格曼的信（一八七〇年六月二十七日）判断，这一群“吹牛的战士”主要是指这些人：

朗格（Лангр 1828—1875年）德国哲学家、新康德主义者，典型的资产阶级民主主义者；

希勒尔（Бюхнер 1824—1899年）德国哲学家、生理学家、庸俗的唯物论者；

弗西勒（Фехнер 1801—1887年）德国哲学家、物理学家；

杜林（Дюринг 1833—1921年）德国哲学家、经济学家。

这些平庸的“吹牛战士”，特别是朗格，他感到奇怪，为什么马克思和恩格斯会在他们早已把“死狗”“黑格尔埋葬了”之后还记住黑格尔。事情对于他们就是这样的不可思议。因为这位猖狂自负而又